

文章编号:1674-8107(2023)01-0129-08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理念探析

李天星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洗礼,迫切探求民族复兴之路的五四知识青年基于不同的政治认识,在吸收西方各类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救国理念。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极具影响力的青年社团,其成员皆为接受新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对当时中国的黑暗政治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在新文化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谈政治”的提倡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工读互助、促进妇女解放、开展社会调查等途径,来推行社会改造,创造“少年中国”。实践证明,这种单纯的社会改造的方式无法解决近代中国问题,革命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社会改造;救国理念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2.03.016

五四时期多元文化的输入与碰撞,以及现实困境的纷扰,促使接受新知、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知识青年,纷纷通过创办刊物、集会演讲等方式,表达对民族未来和国家前途的憧憬,并且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诸多救国方案。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最有希望”^[1](P81)]的青年团体,围绕“社会改造”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讨论,并努力在贫弱的中国大地上尝试推行。少年中国学会所秉持的“社会改造”理念,主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改变旧中国的方式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逐步“改造”;二是“改造”的对象是“社会”,而非“政治”。

实践证明,任何带有浪漫色彩、空想式的“社会改造”都终归破产,只有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国人民的最佳选择。少年中国

学会的社会改造理念亦是如此。五四运动后成员所持“主义”的差异,最终导致少年中国学会的解散。不过,作为近代中国人探寻救亡图存历程中的方案探索,其仍具有存在的历史意义。尤其践行“社会改造”理念的失败,让更多的知识青年意识到,只有革命才能实现旧中国的根本“改造”。本文旨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①,对此作进一步探讨和分析。以期深化对五四时期知识青年思想多元发展的认识,同时也为梳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逻辑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一、少年中国学会的时代特征

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让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民族前途的先进中国人,在思想上迎来一次大解放。被视为“分划中国之政

收稿日期: 2022-04-20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VSZ1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李天星(1986-),男,山东费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①李永春.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李永春.《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6;陈正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陈先初.五四时期王光祈社会改造思想之考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

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2]的五四运动,更是让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爱国的感召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此间,西方多元政治学说的引介与辩论,让大批知识青年在新文化领袖的指引和鼓励下,开始寻找乃至开创一条符合心中理想的民族复兴之路。在共执同一个理念的基础上组建团体,成为五四时期青年群体的普遍现象。少年中国学会便是典型。

1918年6月30日,李大钊、王光祈、曾琦、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学会于次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员遍及全国多个省份,甚至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亦有分布。由此可见,其影响力覆盖面之大。同时,为了广泛传播学会理念,还编辑出版多种刊物。北京总会编辑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南京分会编辑出版《少年世界》月刊,成都分会编辑出版《星期日》周刊。至1925年南京大会之后,少年中国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在无形中解散。

即便少年中国学会看似是一个松散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但其对于成员资格审查和吸纳却是极端谨慎的。“本会取人,抽象的条件,要有特性、特操、特长三种。具体的条件,最上要能著书,其次要能著论,再其次要能作学术谈话”。同时规定凡是入会者,必须五位成员的介绍,经评议部认可之后才可以正式成为成员。如舒新城便是经李儒勉、曹刍、杨效春、穆济波、恽代英五人的介绍之后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

最初少年中国学会拟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后在正式成立时听取李大钊等人的意见,将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使之更加符合五四运动之后改造中国热潮的需要,并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八个字为信条。

少年中国学会孕育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多元社会思潮交织下产生,蕴含着五四时期新青年的热血与朝气,带有探求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

之路的时代烙印。正如主要发起人王光祈所言,少年中国学会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少年中国”。这一“少年中国”不是属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也不是属于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的,而是“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3]。既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少年中国学会呈现出两个重要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皆为新一代的知识青年。他们基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很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大学、南洋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巨擘多有往来。还有部分成员如李璜、周无、曾琦、王光祈、郑伯奇等曾出国留学。新式教育的引导和多元思想的沉浸,让他们更乐于去把握时代脉搏、了解世界新知。五四时期盛行的社会改造理念便成为他们最初的选择。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期”^[4]。虽然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胡汉民、张东荪等人所持“主义”各异,但对于社会改造最初却都十分肯定。在这种氛围中,五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团体,如解放与改造社、新社会、共进社、社会改造社、江西改造社等。广纳五四新锐、成员多达百余人的少年中国学会更是其中代表。

其实,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在政治信仰上其实有很大差别,这在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颇为流行的学说,在学会中皆有支持者。然而,通过社会改造来实现救国的理想,则成为凝聚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支撑。“少年中国学会到后来分为两派,两派的政见和主张虽有不同,但其图谋改造中国根本思想与社会结构之目的则一。”^{[5](P69)}关于这一点,宗白华亦有同感。“当时青年的求知欲和关心国家前途的热情是普遍的。第一次欧战的结束和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青年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青年们相见时,不论识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热望,胸怀坦白相示,一见如故。

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们就是这样集拢起来的,组织起来的。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6](P554)}

另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18年,众多青年因北京政府签订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抗议。更是有一大批留日学生基于民族义愤,纷纷罢学回国^①,并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青年群体开展爱国运动。此次事件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少年中国学会正是在这场反日运动的推进与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孕育成立的。

少年中国学会原评议部主任曾琦,在论及为何赴法留学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贯彻排日的宗旨”。当然他也指出,这并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只是“想来反对强权,是要贯彻到底的,觉得日本人常在国际间活动,毁坏我国的名誉。”所以想去法国之后将其在日本亲眼所见的“日本人反乎协约国的论调,违背正义人道的行为,侵略我国的阴谋,镇压朝鲜的毒计,择要介绍于法国言论界,使欧洲人也明白日本的真象”。^[7]

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与不公,让在奋进之中唤醒的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去反思和重塑爱国精神。正如陈独秀所感慨的那样:“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8]民国之初内忧外患的局面,极大的激发了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并将满腔报国之志付诸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设想之中。

二、社会改造理念的形成

二十世纪以来,救国道路探索失败后的迷茫,以及现实发展困境的纷扰,让近代中国的知识分

子把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无论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都是如此。然而,如果说梁氏还沉浸于通过培养具有“新民”意识的“少年”,进行改造“老大帝国”的想象中,而陈氏则更进一步,力求塑造摆脱封建思想与文化束缚、具有科学意识与民主精神的“新青年”。少年中国学会从它成立之日起,便通过各种努力为民族未来和国家前途奔走呼号,以展现历史新阶段的青年特质。

与其他许多新兴青年团体不同的是,少年中国学会最初并未标榜或信奉某一主义,而是单纯的把构建“少年中国”作为共同的理想追求。“少年中国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划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成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崇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9](P3)}这也是吸引和维系诸多不同派别与主张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因素。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不仅拥有共同的“少年中国”理想,而且最初对于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策略也达成共识。即远离政党,不谈政治,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造。少年中国学会初期之所以重视“社会改造”,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首先,广大知识青年对当时中国黑暗的政治感到不满与失望。“本会同人何而为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5]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建立了中华民国,试图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而后袁氏冠冕堂皇地登基称帝以及其后北洋军阀的混战割据,严重摧残了国民对民主与富强的憧憬。“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故后‘五四’之前一年

^①据李璜回忆,自1918年5月至7月间,自日本罢学回上海与北京者达三千余人,且这批人大都成为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又从政治改革转向了思想改造”。^{[10](P23)}所以,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把对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对社会的改造,并将其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力求通过构建“少年中国”来实现民族复兴。

其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对“不谈政治”的提倡。长期受到封建伦理观念束缚的知识青年,更能在心理上引发对“新文化”的认同,进而产生共鸣,内化为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准。尤其是在《新青年》旗帜的引导下,青年对新时代、新社会的追求与向往,逐渐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思想认识。对一种理想社会的真诚而急切的信念;对科学、理性的无尚崇拜;对现实政治的否定、拒绝和回避等三个方面,成为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认同影响最大者。^{[11](P8)}《新青年》在创刊时便明确指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办刊宗旨,而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再次强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2]。陈氏对于政治变革与思想改造两者关系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知识青年的价值判断。正如王光祈所坚持的那样:“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命,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13]

最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多元、文化激荡的年代。形质各异的西方政治学说伴随着“民主”和“科学”汹涌而来,并以“新文化”的姿态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既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这既为近代中国人探寻民族复兴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道路选择,同时对那些带有强烈求知欲和迫切救国心的知识青年产生较大影响。只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辨别能力,许多青年只能笼统地吸收一些有助于实现自身救国理想的学说加以利用。^[14]这种对新知的渴求促成了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新青年”的出现。但是,他们在一心求新的最初体验中并没有耐心和力量对这些西方政治学说加以细致辨别,而是择其要者,为我所用。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在民国初期的中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经过刘师培、李石曾等人的译介宣传之后,其互助论在中国吸引了大批信众。即便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支持者李大钊,亦曾将互助视为人类进化的真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们自然深受其影响,不仅对其理论深感信服,而且还专门撰文加以介绍。如魏嗣銮在《人类进化的各面观》一文中认为:“欧战以后,我们看见协约各国,互相扶助,遂操胜算。德国虽强,孤立无辅,终归失败。然后深切觉悟,物竞天择,固是生存不易之理。互助共济,亦是战胜唯一之因。大家才把克洛泡金的书,取来细看研究其理,然后知道兼弱攻昧,是大乱之因,博爱互助是大同之要。”^[15]

与此同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同样受到当时知识青年的追捧。这既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实验的成功有关,同时亦深受周作人等在《新青年》《新潮》等畅销刊物上专文介绍的影响。以王光祈、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中间派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便接受了新村主义,幻想脱离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去农村、乡下开辟一块新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互助友爱的新社会,然后“用这个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的社会渐渐革新,成了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16]。此时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们对于革命还缺乏必要的认知,专以社会改造为己任,并以此为救国之大道。

三、社会改造理念的实践

作为五四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社会改造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拯救中国命运,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手段。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出发点便是试图通过对中国开展全方位的改造,从而造就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少年中国”。那么,究竟该如何进行社会改造呢?倘若对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观点加以细致梳理,我们便可以发现,虽然大家皆主张改造社会,但具体措施与方式却不尽相同。

李大钊就曾认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智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17]。在这里,李大钊已经在推行和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注重“劳工团体”的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少年中国学会社会改造理念的实施路径,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平民教育之普及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让知识青年深刻意识到,若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建立民主有序的政治体制,只靠文人政客是不行的,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但由于当时国民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所以,改造社会的首要途径便是开展平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通过露天演讲的方式增进平民智识,进而“达到吾人改造社会之目的”。^[18]同年10月,全国学生联合会讨论通过由李中襄、刘广平提出的《实施平民教育案》,要求各地学联、各学校学生会设立平民义务夜校和“通俗讲演团”,积极开展平民教育,“以唤起社会上的觉悟,养成社会上多数人民的能力”^[19]。少年中国学会亦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大势所趋,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并将其视为学会践行“发展社会事业”这一宗旨的重要实现途径。王光祈便主张,劳动者可以到一切学堂前去免费自由听课,而雇主也要减少工作时间,替劳动者办补习学校。^[20]少年中国学会还拟仿照日本庆应义塾的办法,在上海创办法学,分政治、经济二科,以养成应用人才。南京分会亦曾专门筹设学校,“其所标之义,一则曰实现本会的宗旨,二则曰创造中国的教育”。^{[21] [17]}

(二)工读互助之提倡

随着“欧战”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社会对于劳动价值以及劳动者的认可程度愈来愈高,“重读书,轻劳动”的习气逐渐发生改变,“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

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25] [15]}。在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工读互助被视为救国之良药,并大力去提出,努力去践行。“今日唯一的救贫法子,就是提倡劳工。我不是说不应该读书,是说书要读,工也要做。读书做工同样的紧要,实行那‘工读’的主义”。^[23]

1919年,王光祈在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鼓励学生边读书边参加劳动,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摆脱对家庭的依赖,“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24]。工读互助团一时为知识青年所推崇。不仅许多外地学生闻讯专门赴京参加^{[25] [156-62]},而且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效仿成立。

(三)妇女解放之促进

新文化运动中对“新道德”的提倡、“旧道德”的批判,使得近代中国的妇女观发生显著变化。以肯定女性贡献、提高女性地位为目标的妇女解放运动也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而进入新阶段。少年中国学会将促进妇女独立,视为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和创造“少年中国”首要问题。“因为妇女占全国人数之半,若是妇女问题不解决,那就是半身不遂的‘少年中国’”^[26]。

为此,《少年中国》月刊专门编辑出版“妇女问题”特别号,《少年世界》推出“妇女号”特刊,《星期日》推出“妇女问题号”。不仅大力介绍苏俄、欧美等国家的妇女运动情况,而且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以及部分会外人士围绕妇女解放问题展开讨论,提出解放妇女的设想,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改革、人格与经济独立等。如宗白华认为,中国的新女性需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其标准是:崇尚实际人格不慕虚荣;研究真实学术具世界眼光;真诚热烈之心胸;优美高尚之感情;强健活泼之体格。^[27]需要指出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虽然主张妇女解放,并提出可以吸收女性加入,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女成员的记录。

(四)社会实况之调查

虽然五四青年热心于改变国家现状,努力探

寻民族复兴之路,但他们因多在校园内活动,对社会情况及潜在问题都缺乏一定的了解。即便是社会上活跃的“革新家”也往往因缺乏对实情的考察而陷入改革困境。“所以改造社会这桩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定要有个进行的线索和程序。要有个进行的线索和程序,那么就要从实际方面考察,先看看社会的情形到底是怎样一个样子,再想想我们纸上的革新运动,社会一般的人可能有领受的机会没有?然后看如何对症下药,切切实实的下手。”^[28]

为此,少年中国学会强调要通过社会调查来发现实际问题,研究社会现象,并以此来寻找改造社会的途径与方法。王光祈便提出要组织国内旅行团和国外旅行团两种组织,以体现注重研究真实学术与从事社会事业的学会精神。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所发行、1920年1月创刊的《少年世界》,其宗旨是“作社会的实际调查谋世界的根本改造”,于是注重“专载各种调查及关于应用科学之文字”^[29]。所刊文章中所占篇幅最大者即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与知识青年利用各种机会对中国各地工厂、农村、学校和其他社会情况所作的调查,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

结语

新文化与新思想的洗礼,让五四知识青年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寻找救亡图存之路。以社会改造来创造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少年中国”,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的理想。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旧中国贫弱的根本症结,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终归失败。值得庆幸的是,此番挫折使这些胸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五四知识青年,在思想与行动上都有显著转向。

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社会组织能力得

到提升,为日后各类政党的组建训练了人才。以当时受到热捧、并进行过局部实验的工读互助为例,李璜在回忆该运动时曾说:“这一社会运动,确乎开启了青年知识分子脱离家庭,而思以劳力自活的风气,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了先锋,亦间接为中国共产党训练出早期干部人才,如邓中夏、恽代英、杨贤江等会友均是光祈工读互助团中热心分子;而李大钊之新村运动,毛泽东响应之,则又是光祈另一种社会运动法。”^[30]

另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在实践探索中出现分化。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碰撞、政治分流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便因信仰不同而最终与同为新文化领军人物的胡适分道扬镳。少年中国学会社会改造理念实践的失败,促使部分青年走上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让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需要坚持唯物史观分析现实问题,必须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线,单纯的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正如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所言:“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31]在这里,陈独秀的“社会改造”不仅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论不同,更是超脱于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途径,那便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革命则成为唯一的选择。

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民族主义相伴,批判性与现代性并存。在最富朝气的年龄,五四知识青年为了创造理想中的富强中国而奋进、探索。先进的中国人在反复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实践的经验,历史的选择。

参 考 文 献

- [1] 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蔡子民先生言行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2] 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J].向导,1925,(113).
- [3]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J].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3).
- [4]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J].新潮,1919,(1).
- [5] 傅彦长.王光祈先生纪念册[M].内部刊物,1938.
- [6] 宗白华.少年中国学会回忆点滴: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北京:三联书店,1979.
- [7] 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J].少年中国,1919,(3).
- [8]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J].新青年,1916,(2).
- [9] 黄仲苏.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M].内部刊物,1938.
- [10]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 [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 [11] 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6.
- [12] 本志宣言.新青年[J].1919,(1).
- [13] 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J].少年中国,1922,(8).
- [14] 夏衍.夏衍全集·文学(下)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 [15] 魏嗣銮.人类进化的各面观[J].少年中国,1919,(1).
- [16] 宗白华.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J].少年中国,1919,(5).
- [17]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J].少年中国,1919,(3).
- [18]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J].北京大学日刊,1921,(916).
- [19] 全国学联实施平民教育案[N].民国日报,1919-10-05.
- [20] 若愚.劳动者的权力[N].晨报,1919-05-02.
- [21]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M].上海:中华书局,1924.
- [22]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A].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23] 观海.今后青年之责任[J].南洋周刊,1919,(1).
- [24] 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N].晨报,1919-12-04.
- [25] 陈秀萍.俞秀松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 [26] 本月刊第四期特刊“妇女号”的启事[J].少年中国,1919,(3).
- [27] 宗之樾.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J].少年中国,1919,(4).
- [28] 何恒.社会改造之先决问题[N].民国日报,1919-08-06.
- [29] 学会消息[J].少年中国,1919,(6).
- [30] 李璜.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与成立[J].传记文学(台北),1979,(1).
- [31] 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J].新青年,1921,(4).

On the Ideas of Social Reform of the Youth China Society in the Period of May 4th

LI Tian-xing

(School of Marxism,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who were eager to explore the road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put forward many ideas of saving the country based on different political understandings and various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As an influential youth association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members of the Youth China Society are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 who accept new knowledge and have strong patriotism.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dark side of politics in China at that time and influenced by the idea of "not talking about politics" advocated by the new cultural leaders Chen Duxiu and Li Dazhao, anarchism (mutualism), new village doctrine and other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hey tried to promot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e a "Youth China" by popularizing education for masses, advocating part time job for study, promoting women's liberation, and conducting social survey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is simple wa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of modern China, and that revolution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y.

Key words: Period of May 4th; Youth China Society; Social reform; Concept of saving the nation

(责任编辑:江毓君)